

LES TROIS DUMAS



〔法〕安德烈·莫洛亚著

三仲马传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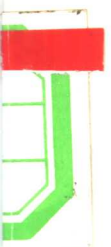


JE ME PROPOSE d'étudier, dans les trois générations de la famille, les formes successives d'un talent étonnamment fécond, de l'union d'un gentilhomme français et d'une esclave noire de Saint-Domingue. Les trois hommes dont nous aurons la vie eurent tous, à des degrés différents, les mêmes aspects divers, les mêmes qualités : le même dévouement chevaleresque, honneur actif de soi-même et au même défaut : besoin, par désir, de revanche sur le destin. Sur ce canevas initial brodent les événements la volonté.

Voilà donc mon ouvrage aux trois titres.

OU UN DRAGON DE LA GARDE IMPÉRIALE ET UN GÉNÉRAL DE LA GARDE NATIONALE

En 1789, après la chute de la Bastille, le jeune Dumas, fils de Voltaire-Cottinets, se présente à Paris et s'engage dans la garde nationale puis des volontaires, guerrier et de culture.



三仲马传

[法]安德烈·莫洛亚著

郭安定译



人民文学出版社
一九九六年·北京

(京)新登字 002 号

著作权合同登记号:00993 号

ANDRÉ MAUROIS
de l'Académie Française
LES
TROIS
DUMAS

© Librairie Hachette, 1957

本书经法国阿歇特出版社授权我社
在中国独家出版。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三仲马传/(法)莫洛亚著;郭安定译. - 北京:人民文学
出版社, 1996. 12

ISBN 7-02-002396-7

I. 三… II. ①莫… ②郭… III. 传记文学-法国-现代
IV. I565.5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96)第 13504 号

人 民 文 学 出 版 社 出 版

(100705 北京朝内大街 166 号)

北京外文印刷厂印刷 新华书店发行

字数 426 千字 开本 850×1168 毫米 1/32 印张 18.875 插页 4

1996 年 12 月北京第 1 版

1996 年 12 月北京第 1 次印刷

印数 1-10000

定价 27.00 元



作者 像

作者画像：张守义作



仲马将军——大仲马之父



大仲马之母——仲马将军之妻
玛丽-路易丝·拉布雷

大仲马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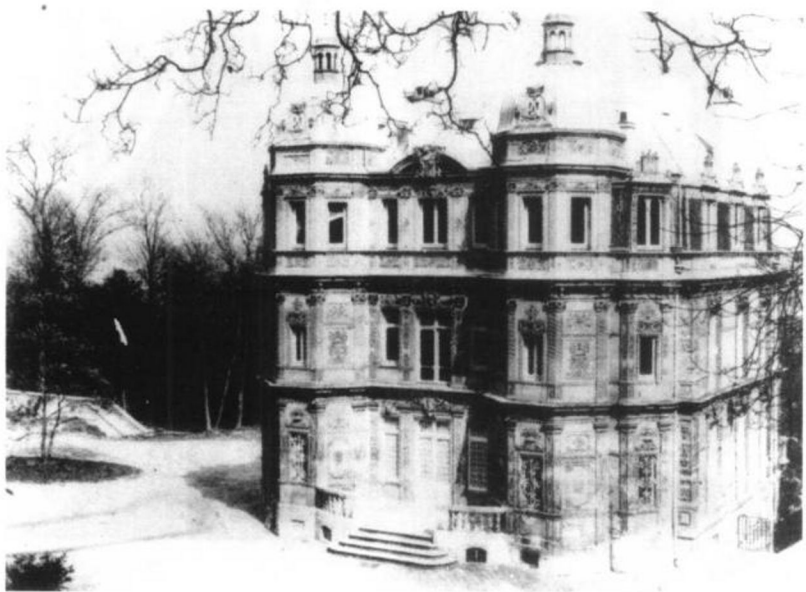
小仲马之母 单纯、正直、勤劳、
忠实的卡特琳·拉贝



阿尔瑟纳勒沙龙, 灯火通明,
新流派成员在此聚会



大仲马之妻伊达·费里叶
一八四〇年与仲马结婚, 一八
四四年分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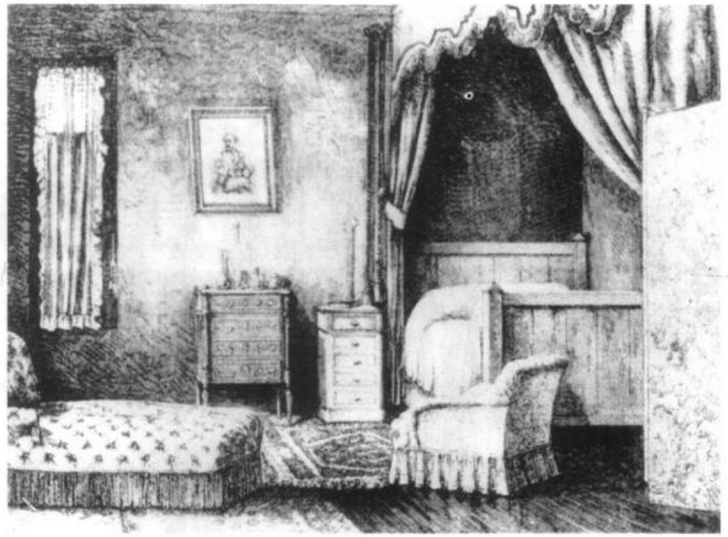


基度山城堡



大仲马和女儿玛丽·仲马，
一八七〇年仲马死于她的怀抱

大仲马在这间卧室内去世



小仲马



译 本 序

“三仲马”，顾名思义，指的是仲马一家三代人：法国大革命时期的将领托马·亚历山大·仲马（1762—1806），他的儿子、法国著名剧作家和小说家、《三剑客》和《基度山伯爵》的作者亚历山大·仲马（1802—1870，通称大仲马），以及后者之子、《茶花女》的作者亚历山大·小仲马（1824—1895）。

对于中国读者，大仲马和小仲马的名字，以及上面列举的那三部作品，可以说是家喻户晓的了。也许并非偶然，在中国近代文学翻译史上，第一部译成汉语的西方文学作品，恰好就是《巴黎茶花女遗事》。这部出自大名鼎鼎的林纾之手的译本，出版于上一世纪的最后一年，离小仲马去世只有四年时间。林先生在译本的《引》中，提到了“仲马父子”，说两人的文字“于巴黎最知名”。到了本世纪初，大仲马的小说《三剑客》及其续集《二十年后》，又由著名翻译家伍光建先生从英文节译，分别以《侠隐记》与《续侠隐记》为标题出版。从此以后，仲马父子的作品，在中国广为流传，经久不衰。记得七十年代末期，“四人帮”的文化禁锢刚刚打破，《三剑客》和《基度山恩仇记》的法文原版影片在北京放映，译者本人被“请”去担任现场翻译；那“赶场”的匆忙情景和观众表现出来的浓厚兴趣，至今仍历历在目。《三仲马传》的作者说得好：“在全世界，声望超过大仲马的人，恐怕并不多见。地

球上各民族都读过他的作品，并将世代读下去。”^①

在世界文学史上，像大仲马和小仲马那样，父子相传，各自都写出足以传世的杰作，恐怕还是不多见的。为他们作传，把父子两人的生平与创作，按照当年生活的本来面目，交叉糅合在一起，向读者展示，当然会引起广泛的兴趣。然而，为什么还要拉进一个并不善于舞文弄墨的武夫，充当这个“书香门第”的鼻祖呢？其实，传记作者的高明之处正在这里。首先，这位将军短暂而不平凡的一生，本身就充满传奇性；而两位文学家，特别是大仲马，无论是体质、气度、性格，还是思想与政治倾向以及生活道路，都与这位行伍出身的革命将领的命运一脉相承。三代人的传奇生涯，从法国大革命前夜直到十九世纪末，延续了一百多年；这个时代在法兰西的历史上，是一个波澜壮阔的时代，也是一个翻天覆地的时代，世道变幻神奇莫测，有声有色的事件连绵起伏，刀光剑影随处可寻。传记作者在讲述三代人悲欢离合的同时，充分展示了时代的复杂纷繁；二者相得益彰，给读者以启示。读了《三仲马传》我们感到，大小仲马两代文学家的血管里虽然流淌着仲马将军的血液，然而他们更是自己时代的儿子。至于仲马将军，这个诺曼底贵族与圣多明各女黑奴结合的产儿，在法国大革命后只用四年时间，就从一名普通士兵提升为独当一面的将军；而后来一旦失宠于登上帝位的拿破仑，则只能落得贫病交加，刚过不惑之年就抑郁而亡。正如作者所说：“如果我的传记还有一点可取之处，那就是随着主人公逐渐发现人类社会的同时，展示出社会的风貌。”^②

① 见本书“作者序”。

② 莫洛亚：《文学生涯六十年》。

《三仲马传》的作者是法国著名作家安德烈·莫洛亚(André Maurois, 1885—1967)。莫洛亚是一位具有多方面才能的作家。他的长篇小说《氛围》被视为法国现代文学中的一部杰作;其短篇小说也独具魅力,结尾往往出人意料,受到很高的评价。此外,他还写了大量随笔、游记、评论,乃至历史著作。但是,在他的全部创作中,传记文学闪耀着独特光彩,占有突出的地位。莫洛亚的传记作品兼具历史与文学的双重性质。作为史传,务求真实,广泛搜集档案材料、信件、日记、同时代人的回忆作为凭借,“从不加小说般的演绎;既不杜撰什么场景,也不生造什么对话”^①。另一方面,他的传记又是文学作品,除了这位大作家有一支生花妙笔,文字优美生动之外,主要在于他能够从大量纷繁复杂的材料中,发掘出反映传记人物性格特征的事实,捕捉富有意义和情趣的细节,从而树立起传记人物鲜明的个性与生动的形象。

莫洛亚一生共写有十四部传记作品^②,《三仲马传》出版于一九五七年。作者在序里告诉我们,他之所以写这部作品,是因为在研究乔治·桑和维克多·雨果生平的时候,接触到了一些新的材料,从而想到要把亚历山大·仲马添加到他的那个浪漫派画廊中去。

这里的“浪漫派”,或称作浪漫主义,是法国十九世纪前半叶

① 莫洛亚:《文学生涯六十年》。

② 这十四部传记是:《雪莱传》(1923)、《迪斯雷利传》(1927)、《拜伦传》(1930)、《利奥泰传》(1931)、《屠格涅夫传》(1931)、《伏尔泰传》(1932)、《夏多布里盎传》(1938)、《追寻普鲁斯特》(1949)、《乔治·桑传》(1952)、《雨果传》(1954)、《三仲马传》(1957)、《弗莱明爵士传》(1959)、《拉法耶特夫人传》(1961)和《巴尔扎克传》(1965)。

主要的文学流派。它兴起于二十年代,发展到一八三〇年七月革命前夕,已达到了最高潮,进入四十年代便趋向衰落。在政治上,这一时期是王政复辟的年代;资产阶级的浪漫主义文学,配合资产阶级反对复辟的政治斗争,充满了个性解放的精神,带有强烈的反封建色彩,具有进步的历史意义。戏剧领域是资产阶级浪漫主义与受到传统势力支持的伪古典主义进行斗争的主战场。一八二八年,雨果发表了声讨伪古典主义的檄文——《〈克伦威尔〉序言》,从而形成了一个声势浩大的文学运动。一八三〇年,雨果的名剧《艾那尼》上演获得成功,标志着浪漫主义运动的高峰。然而,不应忽略大仲马的功绩:一八二九年二月十一日,在法兰西喜剧院上演了他创作的《亨利三世和他的宫廷》;该剧的演出,是浪漫派戏剧射出的第一响重炮;它的成功,为以雨果为首的浪漫派戏剧的胜利,立下了头功。《亨利三世和他的宫廷》虽然是一部历史剧,但在复辟王朝已近末日的时候,把十六世纪封建阶级的黑暗统治在舞台上揭露出来,本身就具有现实的社会意义;再加上戏剧冲突尖锐,情节发展动人心魄,一时间把一个闯荡巴黎刚刚六载的外省青年捧上了明星的宝座;他当时一无靠山,二无金钱,三无高深的学问;他所拥有的,只是年轻人的雄心壮志和从父亲那里继承下来的共和思想,还有就是机遇的成全了。传记的作者通过桩桩件件生活事例,趣味盎然地告诉我们,一个男孩子是如何取得成功的。读到这里,我们一方面受到情节的吸引,又无形中获得了某种人生的启迪;同时,进一步明白了为什么莫洛亚写的传记被誉为“传记小说”,尽管他本人并不接受这种提法,说自己只是“力图从传记人物伟大的一生中抽取富有小说情趣的细节”^①。

^① 莫洛亚:《回忆录》。

传记通过丰富的材料，展示了大仲马多方面的性格与风貌。我们看到，这位真诚的共和派人士，怀着饱满的政治热情，积极投入到时代斗争的洪流中去。一八三〇年七月革命刚刚爆发，他便拿起自己的双筒猎枪，为推翻查理十世的反动统治，出没于枪林弹雨之中。后来，他又与登上王位的路易-菲力普决裂，参加了一八三二年的六月起义，上了七月王朝的黑名单。到了一八四八年，巴黎人民起义，他又毅然走出那座豪华的“基度山城堡”，率领圣日耳曼的国民自卫队，向七月王朝发起攻击。随之上台的路易·拿破仑，加紧了帝制的步伐；大仲马终于抛弃了幻想，步雨果等人的后尘，亡命布鲁塞尔。年过花甲，他还亲赴意大利，参加加里波的领导的意大利民族解放战争。

四十年代以后，尽管大仲马还在写戏剧，甚至建立了自己的“历史剧院”，他的创作却转向了长篇小说。莫洛亚在传记中没有花多少篇幅概述大仲马那些卷帙浩繁的小说的情节，只是围绕他的两部代表作，《三剑客》和《基度山伯爵》，不慌不忙地告诉我们大仲马是怎么写起小说来的，而他又是怎样写小说的。这里我们又一次看到大仲马对时势变化的敏感；他又一次捕捉住时代的机遇，从剧作家变成了小说家，将自己的天才发挥到新的高度。大仲马的小说诚然非常“通俗”；正因为如此，直到二十世纪五十年代，当莫洛亚撰写《三仲马传》之前不久，还有一些评论家只承认大仲马是位浪漫派剧作家，而拒绝在文学史上给他的小说以应有的地位。于是，莫洛亚打抱不平了。当然，他并不讳言：“将巴尔扎克、狄更斯^① 或托尔斯泰^② 置于大仲马之上，是

① 狄更斯(Dickens, 1812—1870)，英国著名作家。

② 托尔斯泰(Tolstoi, 1828—1910)，十九世纪俄国伟大作家。

理所当然的。就我个人而言,对前面三位的评价当然也是更高一些;然而,对一位使我在青少年时代就感到乐趣的作家,对这位至今我仍然喜爱其作品所表现的力量、激情与气度的作家,我仍然保持着敬重与爱戴。”^① 说到《三剑客》风行全球那么长久,莫洛亚指出:“大仲马在人物的身上朴素地表现出他自己的气度,满足了不同时代、不同国家对于建功立业、英勇无畏与慷慨奋发的需求。写作技巧也完全适合这类体裁,以至于至今仍为有志于一试此道的人所效仿。”^② 他赞成这样评价《三剑客》:“对法兰西怀有炽烈的情感……顽强的意志、贵族式的忧伤、并不总是锐不可当的力量、微妙而多情的风度……造就成可爱的法兰西的缩影。……如果说丹东和拿破仑是法兰西力量的倡导者,那么大仲马在《三剑客》中,就是表现这一力量的民族小说家。”^③ 至于“基度山”,莫洛亚认为:“无论对大仲马的创作还是对他的生活,都是一个关键的字眼。……这个字眼最能体现大仲马既追求豪华宏富、又向往公平正义的梦想。”^④ 他认为,在《基度山伯爵》中,体现了几千年来被侮辱与被损害者对惩恶扬善的义士的期待;只不过到了仲马时代,这样的人物变成拥有巨额财产的富人。大仲马尽管胸怀宽广,但在社会生活里也饱经屈辱。父亲悲惨的遭遇,他本人常被债主逼得走投无路,政治上不得志,形形色色的诽谤与攻击……总之,社会对他的不公正,都在小说中得到反映与补偿。“传记小说”的作者既描绘了大仲马成功的辉煌,又叙述了他失败的凄凉;既暴露他挥金如土、放荡不羁,又不讳言他被债主逼迫宣告破产的狼狈处境;既赞扬了

① 见本书“作者序”。

② 见本书第五卷第一章。

③ 同上。

④ 见本书第六卷第一章。

他对朋友的慷慨与忠诚，又不无调侃地透露：对那些为数众多的情妇，他从未主动断绝对其任何一位的供养。正如莫洛亚所说：“大仲马善于使其生活充满形形色色的行动，如同在其作品中一样。这对传记作家来说，倒是件非常快乐的事情。”^①

小仲马是大仲马与缝纫女工拉贝的非婚生子。私生子的出身给小仲马的心灵打上了深深的烙印：对生母痛苦经历的无限同情，在寄宿学校里所受到的欺辱，父亲放荡不羁的生活带给他的羞耻……都使他倾向于怜悯与同情受到社会不公正对待的女性，使他特别关注社会道德方面的问题。

传记作者用大量的篇幅叙述小仲马与巴黎名妓玛丽·杜普莱西的一段浪漫史。尽管玛丽成为多名有钱人的姘妇，但内心里向往真诚爱情的火焰并没有熄灭。这时的小仲马尽管有纨绔子弟的一面，但能够给这样的女子以一定的理解与同情；他不把她看成下贱的罪人，而视她们为牺牲品；吸引玛丽·杜普莱西的正是这一点。然而，对于小仲马来说，这毕竟是一段风流韵事；不久之后，温存与爱意就被责难所代替；一八四五年八月，小仲马终于同这位名妓决裂了。两年之后，玛丽病逝；噩耗传来，小仲马陷入了极度的悲伤与悔恨。深深的内疚与自责，使他毫不犹豫地拿起笔来偿还欠债。玛丽·杜普莱西是“茶花女”的原型；但是，莫洛亚告诉我们，小说和戏剧《茶花女》中的爱情悲剧，已远远超出了作者本人那一段感情纠葛的范围，而具有一种发人深省的社会意义。

然而，如果说《茶花女》标志着小仲马道德观念的第一次转变，写于一八五二年的长篇小说《珍珠女》则把追求真正爱情的

① 见本书“作者序”。

青年作家转变成为一个冷峻严酷的道德家。从此以后，小仲马在其作品中猛烈谴责在爱情、婚姻、家庭方面的伤风败俗与堕落行为，为被侮辱与被损害的妇女与儿童鸣不平。他的“社会剧”、“主题剧”尽管有时不免给人以说教之感，但却揭露了第二帝国时代上层社会的糜烂生活和道德上的伪善，开创了法国十九世纪以来的现实主义戏剧潮流。

比起大仲马来，《茶花女》作者的经历，较少为公众所了解。这就给《三仲马传》的作者以广阔的余地，旁征博引大量第一手材料，把小仲马的经历、思想演变与艺术创作水乳交融地糅合一起，显现在时代的舞台上，使公众同样津津有味地看到一位与大仲马纠缠不清但又独具个性的人物。作者收集到了大量小仲马的信件，在书中多处大段引用；这些引文虽然可能会使部分非从事法国文学研究的读者感到冗长与枯燥，但耐心读下去，却能叫我们真切地了解到小仲马内心最深刻的精神需求，以及他在生活中如何扮演其自身悲剧中的角色。这不能不说是这本传记的一个特色。

这部《三仲马传》按照作者的意图应当是雅俗共赏的；但不能否认，它首先是为法国读者撰写的。传记内容虽然非常详实与丰富，但是材料的取舍，表述的详略，历史背景的描述，多有不尽符合中国读者习惯与需求之处。尽管如此，我们认为：《三仲马传》目前仍然是了解这两位法国大作家的最佳传记作品。

然而，上面这些因素又使译者倍感译事之艰难。三代仲马的生平经历如此纷纭复杂，他们的时代又是那样事件迭起、人才辈出，而莫洛亚学识又是那样渊博；他旁征博引，史实典故信手拈来，独特的文风不无艰深费解之处。译者在翻译过程中，努力做到理解原文融会贯通，避免生吞活剥与望文生义。有的史实、